

题 引

1. 先生名颢，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国太师题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颐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天不愁遗，哲人早世，乡人士大夫相与议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揭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复明，为功大矣！于是帝师采众议而为之称，以表其墓。学者之于道，知所向，然后知斯人之为功。知所至，然后见斯名之称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万世而常存。

——程颐《明道先生墓表》

2. 叶公沈诸梁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叶公当世贤者，鲁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对也。予元丰乙丑夏为礼部贡院点检官，适与校书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尝论颜子之不迁不贰，惟伯淳有之。予问公曰：“伯淳谁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予谢曰：“生长东南，实未知也。”时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来，尝以寡陋自媿。

——陈莹中《责沈文》

3.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唐子西尝于一邮亭梁间见此语。季通（蔡元定）云：天先生伏羲尧舜文王，后不生孔子亦不得，后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后又不生二程亦不得。

——《朱子语类》卷九十二

4.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

序 一

宋学初起之时，胡安定、孙泰山、石介，皆卓然有儒者之矩范，故后世尊称为“宋初三先生”。此辈人之精神企向，主要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恢复师道，重视人格教育。二是重建道统的呼声。三是文化意识的觉醒。至于义理心性之学，则尚未达成开光显立的使命。因此，“濂、洛、关、闽”之称，自周濂溪始。

周子之著述亦不多，重要的是《通书》与《太极图说》。《通书》开宗明义第一章，便以《中庸》之“诚”合释《易传》之“乾元、乾道”，而复活了先秦儒的形上智慧。但于孔子之“仁”与孟子之“心性”，则未及之。张横渠推进一步，不但重视《中庸》《易传》从道体说性体，对于孟子所讲的“心”，其《正蒙》书中也有“大心篇”以畅发孟子之心性义理，甚至对于孔子之仁，也有相应的体会与讲论，只是文字散列而未作谨严之论述而已。发展到二程，则无论《中庸》《易传》之天道诚体，或《论语》《孟子》之仁与心性，皆全幅透出，全面讲论。而其门人弟子又多而贤，能传承师门之学。故北宋理学，唯洛学最盛。

近世以来，儒学趋衰。学界对历代大儒之学，皆研习不足，对各大儒门人弟子之学则尤为疏隔。所幸改革开放之后，两岸的人文学者，交流访谈，开会研讨。接触日渐增多，自然相知益深，而庶几可以证见中华文化之大回转，已相当明显地进到有根有柢的境地。

上月中旬，湖北省社科院哲学所王巧生博士，来长途电话，说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二程弟子心性论研究》即将出版，希望我为他的新书写一篇序。我说我已八六高龄，又是肺腺癌与心脏导管支架之重症病患，虽然大体平稳，但亦随时可能出状况，所以不敢应允写序之事。他说：吉人自有天相。祝愿先生早日康复。书稿我还是航空快递寄上，请先生在体力适可的情形下，惠予审阅指正，使后学获取教益。

不数日，一大册的书稿果然寄来。我无力细读，只顺其“目录”“引言”“结语”，先观其大体，觉得王君此书，甚为结实。书分四章，依次讨论二程

弟子之“性论”“仁论与爱有差等”“本心论”“未发之际体中”。各章各节之论述，皆有文献为据，有理路可循。他根据《伊洛渊源录》《儒林宗派》与《宋元学案》，又加上自己的参订，所列二程弟子共计七十人。其中有著作者三十一人。此三十一人之著述论及心性义理者，则颇少见。为什么会这样？对此，我愿略陈浅见，以就教于诸方同道。

北宋之理学的第一阶段。那时，只有义理之开展，尚无系统之分化。同时，各家对于心性关系之解读，也尚未成型，要到南宋才逐渐形成系统之纲领。首先是朱子四十岁起，决定走伊川的路，而确认心性关系为“性是理，心属气”。接着，陆象山据孟子而认定性是理，心亦是理，性与心皆从理上说。另外，胡五峰讲“尽心以成性”（尽“心”的形著之用，使潜存的“性”彰显出来），突出心之形著义。刘蕺山亦云：“性之所以为上，而心其形之者与！”这是牟宗三先生所厘定的“以心著性”之系统。从此遂有宋明理学三系之分：

伊川、朱子系——心性为二（性是理、心属气）。

象山、阳明系——心性是一（性是理，心亦是理）。

五峰、蕺山系——以心著性（心之灵觉，可以形著潜隐自存之性体）。

在这个心性大架构尚未完成之时，二程弟子也很少能够直接论述系统性的心性义理。而王君却正是在如此情形之下，全盘进行程门弟子心性论之研讨解读，而成果丰赡，终能写成一篇够分量的博士论文。其章节之安排，文献之考订，义理之讲明，皆颇恰当而相应。如果还有未及之处，也可以在今后的教研过程中，再加探讨以日臻于充实而融通。

以上所述，很简略。而我此时的心情，正为俗谚所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促使前浪更向前。”儒家学术之前景，光明在望。深盼前修后学，共励精诚，以重现中华文化之光辉。

蔡仁厚

乙未年孟冬之月于台中北轩

序 二

从整体上来看，儒学是中国哲学与文化的主干。在当代，牟宗三的儒家三期发展说最为流行。牟先生在《重振鹅湖书院缘起》（1948年）和《儒家学术发展及其使命》（1949年）这两篇文章中指出，先秦至汉儒（孔孟荀以至董仲舒）为儒家发展的第一期，宋明儒为第二期，民国以来的儒家为第三期。第三期儒家即现代新儒家，还在开展之中，其返本开新的主要任务尚未完成。

儒家发展的第一期以孔孟为主干，包括孔、颜、思、孟、曾、荀和董仲舒等人。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他一方面“述而不作”，自觉地继承三代的文化，继承周人的天命论、以德配天和保民而王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在礼乐文化还很浓厚的时代氛围中发现了“人”本身（人的存在性）的意义，将其看作一切知识和实践的中心，同时由人的存在性，孔子又开展出了“仁”的核心价值观。这即是说，孔子实现了以“仁”定义“人”、以“仁”诠释人的存在的伟大转变，为人类思想的宝库做出了巨大贡献。而通过上接天道、天命，下贯人伦物理，旁摄为仁由己、克己复礼和忠恕一贯等思想命题，孔子将周人以“王德”为中心的天命论转化为以“人仁”为中心的天命论，并形成了一整套贯通天人、形上形下的学说体系。在战国早中期，根据郭店简和上博简，儒家思想在心性论（性情论）、工夫论（道德内化的五行说）、伦理学（位分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禅让说、君权来源和统治术）等方面得到了大力的深化。沿着孔子开辟的方向，战国中期的儒学同样推进了人对“人”自身的理解，即从以“生”为中心转变到以“性”为中心来理解人的存在：理解生命之在己的根源，及人与天命、天道的贯通问题。这一转变始于春秋晚期，成熟于战国中期。从此，这就成为了儒家和诸子理解“人”的基本理路。在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中，据宋儒的说法，曾子、子思、孟子一系得到了孔子的真传，维系着儒家的道统。孟子深化了孔子以来的儒家思想，一方面他提出了性善说和存养的工夫论，另一方面他又旗帜鲜明地“辟杨墨”，并与告子展开了人性善恶问题的辩论。毫无疑问，孟子儒学代表

了先秦儒学的高峰。不过，从先秦到汉代，儒家人性论，特别是人性善恶之从理说与从气说的问题始终没有统一起来，而存在着深度的紧张。我们看到，孟告为此大起辩论，荀子则主张性恶，并对孟子作了严厉的批评。到了汉代，就人性善恶的问题，董子对孟、荀均作了批评。

儒家发展的第二期是宋明儒。宋儒以程朱理学为重心，而明儒则以阳明的良知学为重心，理学和心学对于后半期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极为深入、广泛。经过唐季和五代天下大乱的局面，宋朝在统一中原与南方之后很快采取了重文抑武和优遇士人的措施。在这种新形势下，儒家学说迎来了以理学为核心的又一个发展高峰。从北宋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到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儒家哲学在吸纳和批判佛老，进而返本开新的过程中达到了新的高峰，超越了第一期的思想成就。周敦颐开创了本体宇宙论的新儒学思维体系，融合《易》《庸》之学而以诚体为大原。邵雍精于数理而构造了皇帝王霸的历史哲学，观物经世而肯定了理的本原性。张载勇于造道，以“太虚即气”的命题将本体与变化彻底统一了起来，而他所谓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则无疑深化了儒家心性论的思想内涵。二程更进一步，以“天理”为宗主，在理气论、心性论、中和论、格物致知论和工夫论等方面都有非常深入的论述，他们对于理学思想框架的建立和基本概念的阐明起了关键作用。在二程那儿，“四书学”的概念被最终确立下来，从此儒家经学的重心由六经之学转变为四书之学。同时，北宋理学家接过韩愈的“道统说”，明确地宣称他们的学问是希贤、希圣、希天之学，推崇尧舜，推崇禹、汤、文王、周公，推崇孔子和孟子，以他们为圣人。二程兄弟更是当仁不让，自谓继承了孟子以后千载不传之统。而在人生境界和目的论上，理学家的志向十分高远、阔达，如程颢云“仁者与万物为一体”，张载云“民胞物与”，又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后，理学经过朱熹等人进一步的深化和综合，而变得更加体大思精；在南宋理宗时，程朱理学最终获得了朝廷的肯定，上升为官方的正统思想。此后，理学进一步影响着整个中国近世社会，乃至对朝鲜、日本和越南等亚洲国家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理学的开创过程中，二程兄弟无疑最为重要，其思想体系具有典范意义，对后世学人的影响十分深远。作为一种儒家学问，理学所应具备的诸种要素在他们那里都已经具备了，而且比较丰满和深刻。二程不但学问广大、深邃，而且善于培育人才。在北宋时期，与二程的“洛学”并存或稍前的儒家学派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邵雍的“数学”、王安石的

“新学”和二苏的“蜀学”等。这些学派一般在其奠基人死后不久即告散亡，只有“洛学”和“新学”延续较久。程明道说：“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学、随人才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朱子《伊川先生年谱》）此言不虚，谢上蔡便曾多次赞叹二程锻炼（培育）人才之功。拿二程和张载比较，出自二程亲炙的杰出弟子要远较关学为多，且统系深远，至于朱子，理学臻于高度成熟，博大精深。我们看到，程朱理学长期影响着东亚社会，近百年来它虽屡经“新文化”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刻意污名化和大力否定，然而迄今不但根株未绝，而且呈现出蒸蒸日上之势。

程朱理学在近世中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地位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系统、深入而细致地研究理学的发展和变化，这是当代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据《伊洛渊源录》《儒林宗派》《宋元学案》及巧生博士的考订，二程的亲炙弟子（不包括再传弟子及私淑弟子）共有70人。其中，最著名的弟子有杨时、谢良佐、游酢、尹焞和吕大临等人。杨时开辟了道南学派，一传为罗从彦，再传为李侗，三传为朱子，朱子集理学之大成。此一系为理学之大宗，合称为“程朱理学”。这些弟子，特别是四大高弟和吕氏兄弟，无论是在传承二程和前辈学人的思想上，还是在推进理学的发展上都贡献良多，是理学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因此研究理学，特别是宋代理学史，毫无疑问应当对他们的行事和思想详加考察与梳理。当前，虽然学界对二程弟子的研究已有相当的积累，然而与二程、张横渠等理学大家相比，还是很不够的。因此对二程弟子的思想展开系统、深入的梳理和专题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巧生博士的《二程弟子心性论研究》，正是一部研究二程弟子思想而学有所得的优秀著作。“心性论”是理学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这部专著以作者同名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经过修改和增补而成，凝聚了作者长期研究宋明儒学的心血和心得。除《引言》和《结语》外，全书包括《性论》《仁论与爱有差等》《本心论》和《未发之际体中》四章。另外，该书还包括《二程弟子著述考》《杨时易论抉要》和《侯仲良理学思想阐微》等附录。书中论述涉及谢上蔡、杨龟山、游定夫、尹和靖、侯师圣、吕与叔、周恭叔、郭兼山、刘元承和王信伯等程门重要弟子，他们在心性论上凡有精彩之处，该书一般都作了讨论和概括。应该说，这部著作推进了学界对二程弟子的思想研究，学术贡献表现在多个方面，值得充分肯定。

其一，本书对二程弟子的名录与著述作了详尽的考察。传世文献所记二程弟子数量众多，且凌乱分散；如此，要作全面的考察和辨析，这其中显然

存在着相当的难度。好在朱子、万斯同和黄宗羲等对此已有很好的爬梳，在《伊洛渊源录》《儒林宗派》和《宋元学案》中作了条理和叙述。不过，在巧生博士看来，这些著录还不够完备，且彼此互有出入，亟待补充和订正。在朱、万、黄等人的基础上，巧生博士通过必要的考证，更加准确地钩稽和审订了二程弟子。他的这一工作对于完善二程弟子的名录是颇有价值的。比如，杨龟山之婿陈渊，《伊洛渊源录》和《儒林宗派》二书均未载录，但《宋元学案》认为他是二程的弟子。为此，巧生博士作了考证。他按照相关性和时序对有联系的资料作了全面梳理，然后令人信服地得出所谓陈渊为伊川弟子的说法是不可靠的结论，进而他又指出了这种错误说法的可能来源。除此之外，巧生博士还对二程弟子的著述状况作了全面而翔实的考索。在考索的过程中，他使用了许多重要的目录书和大型丛书等资料，十分辛苦。而且，他顺便指出了这些资料中的一些错误。

其二，本书在研究资料的占有和运用上颇为全面，而其论述常常令人耳目一新。作者在研究资料的占有和运用上大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者，本书使用了新发现的材料来作论证。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使得作者的观点不但有据，而且论证更加有力。举例来说，学界对杨龟山“理气孰为根本”的意见不一。虽然多数学者倾向于认定理是形而上者，更为根本，但是此前的论证总是缺乏直接而明晰的根据。巧生博士则在《周易系辞精义》中发现尚有一些杨龟山的易学文献未为学界所留意，而其中的相关文字恰能作为龟山以理为形而上者、气为形而下者的证据。这样，龟山以理为本的观点就得到了确实的论证。再如对谢上蔡仁论的分析，以往学界的研究一般仅据《上蔡语录》，显得材料不够充分，而巧生博士在论述时又补充了不少见于《论孟精义》但未见之于《语录》的材料，使得上蔡仁论的思想内涵在深刻性与丰富性上大为增加。二者，本书使用了大量与议题相关的间接材料。例如，巧生博士在论述吕与叔的“未发之际求中”或求本心的工夫时，在直接分析此种工夫的内容与性质之前，他提出吕与叔之所以有这种工夫体验，或与其有思虑纷扰之病有关。并且，他指出，这其实是当时学者的通病，是彼时大家热衷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类引文虽然与议题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由此深化了研究的深度，使全书的论述变得更为充实。更为重要的是，对文献的熟稔和广泛占有，使得作者也得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和观点。

其三，本书在理论分析上颇为深入，识见精辟。这是本书最为突出的特点。一般，本书新见的得出，是以前人的相关研究为基础的。其中，巧生博士对于牟宗三的论著情有独钟，他充分汲取了牟先生的一些见解和观点。例

如，作者根据牟氏对本体的能动性的理解而区别了理学的分派，赞同北宋理学以道体和性体为首出，在开始的时候，道德主体与实践的意味还相对较为薄弱的观点等。这无疑有助于本书理论分析水平的提高。但是，巧生博士对于前辈大家的观点并不盲从。这里，仍以牟宗三为例，作者指出牟先生在分析程伊川《论中书》时，其观点前后有矛盾之处。另外，巧生博士认为，牟氏的“超越的逆觉”一语易生误解，并就此专门提出了修正意见。而本书之理论分析和识见的精辟，还源自于作者具有良好的形上学思维素养和理论辨析能力。例如，在第三章的“小引”部分，本书对性体与本心作了集中的辨析。作者指出，性体是无声无臭之体，而本心虽然是理，但是毕竟可感，正如伊川所云“有个形像”，因此是具体的。这样一来，在严格的意义上，性体与本心就是体用的关系。这种区分，是作者依据谢上蔡、游定夫的一些材料而作出的，而相应地，这需要作者具备相当的形上学思维能力。再如，二程及其弟子有着丰富的仁论思想，存在着多种说法。其中之一，便是常常把仁与万物一体联系起来。巧生博士对二程弟子的诸种仁论作了仔细分辨，指出这些弟子虽然常以万物一体论仁，但是除了吕与叔之外，其他诸弟子在本质上并无一“由万物一体训仁”的说法。并且，吕与叔把仁归根于万物一体之气，则此从理上说颇有商榷之处。诸如此类，都展现出作者具有良好的思辨和分析能力，读来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其四，本书的一些观点和结论颇具创新价值和启发意义。作者发现二程的重要弟子皆有形上本心观念和相应的工夫论，并且有些弟子的相关阐发非常突出。此点，乃发前人之所未发。另外，当时程门弟子热衷于探讨一些核心问题，如仁论和未发工夫，它们也与本心论具有内在的关联。在巧生博士看来，这一共同趋向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其内外的必然性。作者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更进一步的解释。简言之，本书的研究对于提高人们对于二程弟子心性论的重视程度及思考本心论的理论建设，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以上是我对王巧生《二程弟子心性论研究》一书的四点看法，未必全面和恰当，敬请读者指正。此外，本书还有不少优点，笔者在此就不一一罗列了。总之，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二程弟子心性论的专著，对于南北宋之际理学的开创、形成和发展都有很好的论述，是一部开卷有益的优秀著作。当然，本书也存在着一些缺憾。比如，理学的理论非常渊奥和绵密，而学者的阐释又辩论蜂起，作者在这些方面还稍显生涩，需要加强训练。又如，本书仅专门论述了二程弟子的心性论，但心性论不足以涵盖理学的所有重要

话题。

最后，需要指明的是，巧生是我的博士生，本书是在鄙人的指导下而由他独立完成的。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是研究阳明后学季本的思想的，由先师萧汉明教授指导。而当巧生毕业的时候，先师萧教授年近退休，不能再担任博士生导师，故他衔师命特地报考了我的博士研究生。巧生素好宋明儒学，在宋明儒的研究者中他最推崇牟宗三先生；从本书可以看到，他在思路和诠释系统上受到了牟先生的深刻影响。回忆当初他决定研究二程弟子的心性论时，我不仅很支持，而且很高兴。原因之一是这二位理学大人物乃在下的乡贤，出生于今武汉市黄陂区。十多年前，当读及朱子《黄州州学二程先生祠记》所云“二程夫子，则亦生于是邦”的文字时，我颇为感动和感慨。巧生的论文选题偏难，且涉及的人物和资料众多。有鉴于此，当初导师组曾建议他缩小研究范围，争取早日完稿、毕业。所幸，他很专心，又很勤奋，如期完成了论文初稿。又经数月的打磨和修改，在2009年9月，他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并于同年岁末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巧生一度在山东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继续研究宋明儒学。自博士毕业以来，他还涉猎了易学和简帛思想，撰写了多篇相关论文，收获颇丰，进步不小。现在，他寄身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除了继续研究理学和心学外，他更加注重个人当下的修身实践——工夫和践行了。

未来，我衷心希望他一如既往地保持自强不息的精神，推阐理学，弘扬孔夫子之道，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是为序。

丁四新

乙未年冬月十五序于珞珈山武汉大学

摘要

二程弟子是接受与传承理学（尤其是二程学问）的第一代人物。他们的理学思想是北宋创始大家之后理学发展、演变的第一步，具有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他们的心性论包含了当时一些核心概念、问题，并具有显著的共同特征、趋向。这些核心问题与共同特征之间既有直接的联系，又有更为根本的、一贯的、内在的义理关联。他们的心性论思想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独特的理学发展史的价值。本书以当时的核心问题、概念为中心与线索，深入二程弟子的相关文献，力图客观地了解其心性论，并试图在北宋理学发展的背景之中，在理学一般义理的参鉴之下，对他们的心性论中显著的共同特征与趋势作一更深刻的、整体性的理解或解释。具体而言，本书的大体结构与内容如下。

引言：清晰地确定二程弟子的范围，说明其著述的总体情况和与本书论题相关的著述的情况；说明选题的意义与缘由，研究的目的、方法与大体思路；概括性地指出当前研究的现状与不足。

第一章主要论述二程弟子的性论。二程弟子深受前辈性、气结合之性论的影响，对天命之性或性之本、气禀及两者的关系有较多的论述，并且其大纲与前辈所论相同。概言之，他们也认为人的天命之性或性之本即天道或天理，是至善无恶的。同时，人又禀气以成形体，专就此一面而言，称之为气禀。天命之性由气禀表现，气禀对天命之性或有遮蔽。所以，人的性之本或本性是至善无恶，但现实之人则有善有恶。人与人的气禀是不同的，因此现实之人性也有差别。气禀是可以改变的。变化气质，去掉其对天命之性的遮蔽，是重要的修养工夫。性气结合的性论不限于人，其中一些重要的方面也用来说明万物之性。总之，他们的性论皆是性、气结合的结构，不过在某些方面有特色与推进。

第二章论述二程弟子的仁论及其对爱有差等的看法。仁论是程门讨论得较多的核心问题。二程弟子的仁论在继承二程仁论的基础之上，又有自己的特点。通过仔细析论各位弟子的仁论之后，对他们的仁论大概可以总结出五

点看法。其一，关于以觉训仁与以生训仁（上蔡用“活”来统合“觉”与“生”）。按上蔡的说法，本心之觉是指觉认义理，即随事能肯认义理，生发义理之心，当恻隐则恻隐，当羞恶则羞恶等。这是广义的“以觉训仁”。而以恻隐之心训仁（如杨龟山、游定夫），可称为狭义的“以觉训仁”。显然，广义的“以觉训仁”包括了狭义的“以觉训仁”。以生训仁之“生”是指本心之生，即本心的道德的生生不已。因为以觉训仁与以生训仁有孟子、明道等的传统，所以他们论仁多少与之有关。恻隐之心或觉知“痛痒”是感通的无隔的或无限的，由此必然体认到万物与我一体的境界。这种境界可称作“仁”。因此有些弟子便多言万物一体。所以，其二，除吕与叔之外，二程弟子之中并无人持具有独立内涵的“以万物一体论仁”的观点。所谓“万物与我一体”之“仁”是以“以觉训仁”（以恻隐之心训仁）为其根本的，它自身没有独立内涵。吕与叔则确有万物一体训仁，他把恻隐之心与仁归根于万物的气的一体，不过这个看法显然是有问题的。其三，义理本质相同的仁论，若其表述不同，则可能在工夫论意义上有重大的不同。其四，有形上本心观念的二程弟子的“以公论仁”，在本质上应与伊川的不同。其五，若有形上本心观念，仁论的实质是对本心（或本心之德）的阐发，因此可归诸本心论。就其心性论的根本的、内在的义理关联而言，最需注意的是第五点。至于爱有差等，他们论之较少，但皆认为爱必有差等，爱有差等是自然之理。

第三章主要论述二程弟子的本心论。重要弟子都有形上本心论及相应的工夫，而且其中不乏极为鲜明的表述。他们的形上本心论是道德实践中真切的体认，而非只是口耳之学。这种一致或相似形成了一种显著的现象或趋势，即形上本心观念（与工夫）的彰显。所谓“彰显”是相对于前辈硕儒而言的。濂溪、横渠、二程论本心皆不如他们丰富与鲜明。虽然明道之学从义理上来说，可谓客观面（道、性）与主观面（本心）皆饱满而为一，但是本心论之丰富与鲜明也不及上蔡、与叔等人。如何解释与理解这种现象或趋势？大概可从三点加以理解。其一，有形上本心观念说明体认性体、道体是能发用的。其二，本心论的彰显这一现象，是他们继承濂溪、横渠、明道发展的必然。其三，二程弟子的本心论应该放在道体、性体为首出的北宋义理大背景中加以理解。总之，二程的重要弟子多有鲜明的本心论的显著的现象应该放在北宋理学以性体、道体为首出的大传统之中理解，而且这是他们继承濂溪、横渠与明道的义理模式而发展的必然。这种现象或趋势一直延续发展，对南宋之理学亦有重大之影响。

第四章主要讨论未发问题。伊川曾与吕与叔、苏季明详细讨论过这些问题，杨龟山等弟子也有相当分量的论述。这些讨论在当时是程门学问的焦点之一，对理学的发展影响深远。这些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一种未发之际求中、体中，或观未发气象的工夫展开的，但是其中也有相应的重要的本体论的内容。这是我们必须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工夫是一种“隔离的逆觉”的工夫。与之相对，有所谓“内在的逆觉”（牟宗三语）。这两种工夫都是本体论的体证，都是先天工夫，也皆应当是儒者日常的工夫。如果有这两种工夫，则说明其体认本体（性体、道体）是能发（神）用的。这是它们相应的本体论内涵。因此，未发问题与本心论、仁论、性论一起紧密地关联于整个心性论的一个根本的义理原则。

结语在上述各部分具体析论的基础上，在北宋理学发展的背景之中，在理学一般义理的参鉴之下，尝试性地对二程弟子的心性论中显著的共同特征与趋势，作一更深刻的、整体性的理解或解释。本书大体初步认为，第一，（形上）本心论的彰显是二程弟子继承北宋三家（濂溪、横渠与明道）义理发展的必然。第二，除本心论的彰显这一显著的共同趋势或现象之外，体认道体、性体是能发用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第三，重要弟子的学问多未继承伊川而发展（若判定伊川之学与濂溪、横渠、明道三家之学有本质上的不同）。第四，二程弟子学问发展的趋向与象山之学的兴起有一定的关系。

目 录

序 一 / 蔡仁厚	I
序 二 / 丁四新	III
摘 要	IX
引 言	1
一、本书所谓“二程弟子”的范围及文献	1
二、选题的缘由	2
三、研究的目的、方法与大体框架	3
四、研究的现状与不足	6
第一章 性论	7
第一节 谢上蔡的性论	7
一、性即天理	7
二、气质与性	9
第二节 杨龟山的性论	10
一、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10
二、龟山性论释疑之一：人之善性受之于阴阳二气？	14
三、龟山性论释疑之二：“变化，神之所为也” ——龟山非“惟气一元论”者	16
第三节 游定夫的性论	21
第四节 吕与叔（吕大临）的性论	26
第五节 其他弟子的性论或相关论述	29
一、尹和靖论性	29
二、侯师圣（侯仲良）	31
三、周恭叔（周行己）	34

四、郭兼山（郭忠孝）	39
五、刘元承	43
本章小结	47
第二章 仁论与爱有差等	52
第一节 仁论	52
一、谢上蔡论仁：以“活”训仁，或仁是本心之活	52
二、杨龟山论仁：以恻隐之心或（狭义的）觉训仁	59
三、游定夫论仁：由恻隐之心见“仁之体”	69
四、吕与叔论仁：以万物之气的一体论仁	72
五、侯师圣与尹和靖论仁	77
第二节 爱有差等	82
一、二程论“爱有差等”	82
二、杨龟山论“爱有差等”	87
三、游、吕、尹、王诸氏论爱有差等	91
本章小结	93
第三章 本心论	97
小引 “本心”观念与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	97
第一节 谢上蔡的本心论	100
一、上蔡论本心及工夫论上的（本心的）证见	100
二、性、心与意	105
第二节 杨龟山的本心论	108
一、龟山论本心	108
二、由龟山论“直”反观其对本心的体认	111
三、本心与“格物”	113
第三节 游定夫的本心论	120
第四节 吕与叔的本心论	125
一、与叔论本心之大要	125
二、从性体心用关系来检视吕与叔之论本心	128
第五节 尹和靖的本心论	130
一、和靖论本心	130
二、本心与“敬”	132
第六节 王信伯的本心论	136

第七节 周恭叔与刘元承之论心·····	140
一、周恭叔·····	140
二、刘元承·····	143
本章小结·····	146
第四章 未发之际体中·····	151
第一节 吕与叔论“中”与未发之际求“中” (“隔离的逆觉”与“内在的逆觉”)·····	151
一、《论中书》中论本心与未发之际求本心·····	151
二、“思虑纷扰”与未发之际求中或求(本) 心(“隔离的逆觉”)·····	160
第二节 杨龟山之论未发之际观中、体中与验中·····	168
一、以心体中·····	168
二、龟山论“中”之义·····	173
第三节 王信伯、侯师圣、郭兼山论中或未发工夫·····	181
一、王信伯：体中与静坐及其他·····	181
二、侯师圣：“中者理也，无物不该焉”·····	183
三、郭兼山论“中庸”与后人的相关争论·····	191
本章小结·····	194
结 语·····	197
附录一 《伊洛渊源录》《儒林宗派》与《宋元学案》所列二程弟子·····	206
附录二 二程弟子的著述·····	219
附录三 二程弟子著述考·····	225
附录四 二程弟子理学思想研究综述·····	271
附录五 杨时易论抉要·····	288
附录六 侯仲良理学思想阐微·····	306
主要参考文献·····	324
简论几位儒家学者的高尚人格(代后记)·····	330

引 言

二程弟子是接受与传承理学（尤其二程学问）的第一代人物。他们的理学思想是北宋创始大家之后理学发展、演变的第一步，具有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他们的心性论包含了当时一些核心概念、问题，并体现了显著的共同特征和趋向。这些核心问题与共同特征之间不仅具有直接的联系，更深刻地反映了根本的、一贯的、内在的义理关联。因此，既有理论价值，又具备独特的理学发展史的价值。^① 故以当时的核心问题、概念为中心与线索，研究他们的心性论思想，并试图更深入地理解其显著的共同特征与根本性的义理关联，对于把握其心性论思想的客观内涵与理论价值，及更深入地了解北宋理学的发展、演变，是十分必要的。

一、本书所谓“二程弟子”的范围及文献

（一）“二程弟子”的范围

本书所谓“二程弟子”是指曾亲炙二程的弟子，不包括私淑，也不包括亲炙弟子之再传等广义的程门弟子或程门后学。显然，相对于二程门人、二程后学而言，二程弟子的范围极为清晰。此种意义上的“二程弟子”，前人已多有考辨与列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伊洛渊源录》《儒林宗派》与《宋元学案》。本书即根据它们确定“二程弟子”的范围，但出于新的考辨等其他理由，这里所谓“二程弟子”与之略有出入。具体而言，所谓“二程弟子”共计七十位。^②

（二）“二程弟子”的文献

就二程弟子著述的总体情况而言，经过比较详细的考察可知，这七十位

① 此则不限于心性论，他们的理学思想整体都具有独特的理学史意义。

② 详见《〈伊洛渊源录〉〈儒林宗派〉与〈宋元学案〉所列二程弟子》及其后的说明。

二程弟子之中，大部分人没有著述被著录；有些虽有著述被著录，但今已不存；而现存有著述的共三十一位。这其中，大部分人现存的著述、文字甚少。^①

在二程弟子现存著述中，理学文献总体上不多。在此三十一位弟子之中，有的完全没有理学文字^②，一些弟子虽有，但极少或几无。^③就本书所关注的心性论而言，二程弟子的现存相关论述更少。因此，虽然有现存著述的弟子共三十一位，但或因其完全无相关文献，或因其相关文献极少而不足论，本书所论并未涉及全部的三十一位弟子。这是必须提前说明的。

二、选题的缘由

为何要研究二程弟子的心性论？其缘由主要有二。

第一，是注意到二程弟子本心论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与趋向。这一现象包含三大方面的具体内容。其一，多位影响较大的弟子皆有明确的本心论，其中不乏论述极为鲜明者。“本心”概念源自孟子。所谓“本心”，是指吾人固有的、形而上的至善之心。“固有的”是指此心是吾人本质上具有的，它不可以存有论上的有无言。^④“形而上的”是指此至善之心是理，是普遍必然的。程门弟子多于“本心”有真切的体认，彰显在本体论与工夫论上，便是论说的鲜明而有力，譬如，谢上蔡认为本心即是天理，是无法去除的。他以推扩本心（“恕”）为最根本的工夫；杨龟山认为四端之心犹如四体，“阙一不可，亦无先后之序”。至于做工夫，则强调由恻隐之心知仁；王信伯认为所谓传圣人之道，其实是传己之心，而“人之心扩而充之，可以参天地，可以赞化育”等。这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共同特征。其二，他们的本心论之鲜明与丰富超过了濂溪、横渠与二程等前辈硕儒。濂溪未曾直接论本心。虽然横渠、明道皆有本心观念及相应的工夫论，而且明道论本心在义理上颇为透辟，但与二程弟子的本心论相比，他们的论述不如后者鲜明与丰富。其三，有些弟子阐明本心的固有性与形而上性十分清晰、有力，但仍然要强调性为“无声无臭”之体，而本心为其“可见”之用的区分，如谢上蔡与游定夫。二程弟子的本心论的上述共同特征、趋势能引发我们一系列的思

① 详见《二程弟子著述考》与《二程弟子的著述》（表）。

② 如刘绚、吕大忠、吕大钧、刘安上、李朴、许景衡、萧楚。

③ 如吕希哲、刘安节、侯师圣、王蘋、郭忠孝、周行己、邵伯温、谢湜。

④ 当然，联系私欲、气质等的遮蔽而言，它可以有隐显，但这非存有论上的有无。